

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

萧超然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 合作制度

萧超然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创造。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经验,阐明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确立、完善的历程以及这一制度的内涵和特征,论证了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对完善这一制度与促进民主建设、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的、翔实的论述。

全书共十四个专题,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较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统一,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和构架的完整性。书中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政党关系、多党合作等基本原理,论述了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它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本书可作为高校政治学教材,亦可作党政干部特别是统战干部的参考读物。

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

萧超然 主编

责任编辑:沈 劭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310千字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301-01376-0/D·0133

定价:5.50元

前 言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所设学科中第一科即为政治学。1949年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前，北京大学和国内其他一些大学，都设有政治系。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国内各大学的政治学系被取消，政治学被视为非科学或伪科学而遭废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又逐渐恢复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对西方政治学著述的引进与介绍，更是篇章纷陈，炫人耳目。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毕竟由于发生过中断，其所研究的领域，迄今仍处于拓荒的阶段，许多问题也只是刚刚在探索。近年来又受到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方向或有偏离，因此，其发展道路远不能说是健康的、坦直的。而如所周知，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已发生了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已远远走在了学理研究的前面。因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把生动丰富的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这是我国政治学界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编著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一书，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中最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论列和剖析，展露于读者之前，算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初步尝试。

编著本书的一条指导思想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联系政治学的建设，进行方方面面的剖析。全书连同

附录共 14 个专题，每个专题论列一个方面，抽出既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较好地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联系的统一，不失为具有体系完整性和理论系统性的政治学专著。我们是试图这样作的，但由于水平有限，肯定未能尽如人意，冗杂差谬，在所难免，热忱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各篇的撰写依次是：前言（萧超然），导论（萧超然、民亢），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晓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金安平），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关系的逐步形成（黄南平），40 年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确立（晓韦），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与发展（汤应武），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依据（伍诗一），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管明），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李成言），坚持多党合作，促进祖国统一（伍诗一），加强多党合作、推动四化建设（仝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金安平），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关系学说述论（李成言），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评析（伍诗一）。全书由萧超然主编，通改定稿。晓韦对全书的整体设计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北大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感谢。

编 者

1990 年 6 月于北大寓所

内 容 提 要

导论：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

(1) 多阶级推进的政治发展过程，必将导致多政党共存的情况。

(2) 各进步阶级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联盟与合作，必将导致相应政党的合作。

(3) 抉择正确的政治发展模式，是完成艰巨复杂的政治发展过程的首要课题之一。能够正确解决这一课题的政党，终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主导者。

(4)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确定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目标、道路和主体性力量，成功地回答了上述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发展过程的主导者，进而成为了多党合作行为中的领导性力量。

总体性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

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

(1) 20 世纪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变迁与发展，客观上为民初政党与政党活动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2) 民初政党与政党活动之所以采取了西方的竞争性模式，这是由当时独特的外在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3)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并不体现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内在本质，因而无法保障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政治发展过程的充分展开。

(4)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负效用：促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失误，加剧了民主力量之间的内耗，涣散了自己的队

伍。

结论：这一悲剧性的实践，催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对新型政党与政党关系的探索与寻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1) 作为一种完全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发展作出了最为巨大的贡献，进而奠定了自己在该时期政治发展过程与多党合作行为中的领导地位。

(2) 新独裁主义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失败，反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对于政治发展过程的重要意义。

(3) 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使各民主党派逐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增强了各进步党派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运动趋势，为有序的新型政党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关系的逐步形成

(1) 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顺利展开，必然引起一个多阶级、多阶层的政治统一战线。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是多党合作关系逐步形成的历史先导和直接政治基础。

(3) 在统一战线的具体运行中，产生出了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协商、合作共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稍加移植与改造，同样成为了多党合作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准则。

结论：多党合作关系不是孤立地形成的，而是在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4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确立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40年代各中间党派赖以兴起和各民主党派赖以产生的基本社会政治前提。

(2) 在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不同党派的合作，同时予以思想、政治方面的帮助与引导，直接促成了新型民主党派的生产。

(3) 新型民主党派的生产及其积极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立场，使相互合作关系的长期化与战略化成为了可能。

(4) 民主革命胜利的客观进程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迫切需要，最终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结论：多党合作制度不是自发地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自觉努力的结果。

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1) 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及其有效运行，直接推动了建国初期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伟大进步。

(2) 多党合作制度的萎缩和名存实亡，是1957—1976年间我国社会政治发展长期陷于曲折与动乱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多党合作制度的重新确立及其完善，大大提高了新时期以来我国现代化与民主化建设的水平。

结论：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基本保障系统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依据

(1) 多阶层的社会结构状态和政治发展的艰巨任务，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社会现实依据。

(2)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基本构想及其学说，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法律依据。

(4)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依据。

结论：多党合作制度必然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1)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完成和巩固祖国统一，是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

(2)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范围和具体形式是极其丰富而广泛的。

(3) 各党派政治地位的完全平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特征。

结论：多党合作制度是适合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基本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

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1) 稳定与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实现手段。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增强这一结构的政治输出与政治输入功能，可以促进稳定和改革。

(2)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不是一个封闭的政治结构，随着社会政治状况的变迁与发展，其自身的完善非常必要。

(3) 上述完善的基本方向与准则，在于是否有益于深化社会主义民主。

结论：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的一条基本途径。

坚持多党合作、促进祖国统一

(1) 实现祖国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这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

(2) 从历史角度考察，多党合作行为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和祖国大陆的统一。

(3) 从现实的角度考察，积极发挥各党派的特殊社会政治优势，有利于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4) 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在，便于重开第三次国共合作，它很

可能成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

结论：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增加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合理性。

加强多党合作、推动四化建设

(1) 多党合作制度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政治生活领域。

(2) 由于各民主党派的特殊社会背景，加强多党合作，将会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结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证明了多党合作在这一领域内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

(1)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更加民主的政党制度，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就形式而言，它比西方竞争性政党模式更加适合于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

(2) 以其稳固、完善的显著优点，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3) 从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多党合作制度成功地保证了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比民初竞争性政党制度和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优越得多。

结论：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多重独创性和优越性的政党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关系学说述论

(1) 没有超阶级的政党和政党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的基本出发点。

(2) 按照经典作家们的构想，如果条件允许，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应当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为其基本的形式。

(3) 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关于建立与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

结论：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关系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

附录：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评析

- (1) 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 (2)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类型。
- (3)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所谓“合法反对”。
- (4)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所谓“公平竞争”。
- (5)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 (6)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区别。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导论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	(1)
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	(44)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75)
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关系的 逐步形成	(95)
40 年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 确立	(116)
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158)
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依据	(219)
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 特征	(244)
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261)
坚持多党合作, 促进祖国统一	(278)
加强多党合作, 推动四化建设	(291)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历史地位	(311)
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关系学说述论	(328)
附录 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评析	(354)

导 论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 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政治发展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专制集权状态向现代民主状态之历史转换过程。具体于中国，这一过程起始于本世纪初，大致涵括了 90 年来我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基本内容，进而决定了现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所以若要比系统深入地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政党制度抑或其它，便不能不从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之回溯与揭示始。

(一)

中国是一个创造过高度封建文明的东方国家。

宋元以降，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体系基本成熟定型，并表现出下列特点。第一，政治结构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和专业化趋向。北宋以后的封建国家机器中，行政、军事、赋税、监察及考选等多种职能性机构开始在中央和地方普遍建置起来，而且其权限职掌的划分较为明确，各有所司，自成体系。依靠这一套整齐划一、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结构，封建国家的统治效率不仅有所增强，而且减免了历史上由于拥权过重过大而引起的权臣、强

藩诸害，从而为统一局面奠定了有利的政治基础。第二，以考试、考绩制为基础的文官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汉唐之际，外戚、宦官、藩镇及门阀显贵势力干政，成为封建国家动荡与分裂的基本因素之一。北宋统治者鉴于前弊，在考试和考绩制度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实行了文官政治。尤其是在元佑年间，政坛上还出现过因政策不同而引发的新党与旧党之争，一度颇有些政党政治的意味。元明清诸朝，虽然一度出现过内廷宦官和皇族显贵再度干政的曲折，但从国家政治生活之主流来看依旧是文官政治。第三，借助于上述有利条件，统一民族国家格局进一步稳固。元代开始，行省制度确立起来，中央权威和大一统局面日趋加强。其后，虽然迭经多种形式的国内战争，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家统一，没有再出现过超军事意义的长期割据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体系的上述特征反映了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历史成就。它们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大师所推崇，而且至今也屡屡引起布莱克、艾森斯塔德等西方现代化研究学者的称道。后者站在理论的角度上认为，分化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结构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有利于向现代政治结构转换；民族国家的先期形成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建设任务之艰巨性等等。对于理想中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过程而言，这些显然不无其利。

同时必须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某种进步性决不应广为夸大，因为它们并不代表它的本质。如若借用美国学者拉卡托斯的硬核假说进行比喻，它们充其量只是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保护带”，实际上决定其本质的“硬核”，则是绝对皇权之下的集权和专制制度。按照阿尔蒙德的分类法，这样一种体系大致可以归入“前动员型独裁体系”之列。其基本特征为，在带有较多现代化因素之同时，其本质却是高度集权和极其专制的。在这种体系下，地方自治和分权不被允许，实际上几乎也不存在。这

一状态对于政治发展过程自然是相当不利的，因为确定无疑地是，它将加重这一过程中民主建设任务的艰巨程度。

明朝中叶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中国政治生活开始了些许微弱而意义深长的变化。在政治行为方面，沿海富庶地区出现了新兴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压榨的斗争。在政治意识方面，黄遵宪等人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主张。如顾炎武的“天下观”，提出以“国”和“天下”两个概念来区别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和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号召人们将自己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支持从体现政权和权威人物利益的“国”转向象征着政治共同体的“天下”。用政治发展理论的语言分析，顾氏的“天下观”实际上就意味着现代的“国家认同意识”。再如黄遵宪的“抑君说”，主张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广泛设立由当代大儒和名儒组成，名为“学校”的机构，每月定期召开会议，天子及郡县官亦须与会，专议其“政事缺失”。这一设想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现代君主立宪制的内容。如此等等，莫不折射出了中国政治亦将向现代民主状态转换的一丝毫光。

在分析 18 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变化历程时，毛泽东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设若把这一思想实验推及于中国政治变化的历程，我们将会看到：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将同样在自身智慧的引导下，独自探索出一条切合于国情和传统的政治发展之路，最终缓慢地步入现代世界。

西方列强的侵入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 19 世纪中下叶大约 60 年的时间里，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产生了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第 620 页。

本的变化。具体于政治生活领域，西方列强的侵入造成了下列诸种后果。

第一，西方列强的侵入促成多种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使中国政治发展带上了更为多元的阶级和阶层性背景。

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严酷方式，使古老沉寂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明的基础起了解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给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结果，中国的社会与文明由传统的单一性结构奇异地重组为传统——现代混合的二元性结构。由此中国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并存，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并存，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不好走的路并存的奇异现象。^①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两种文明下各自连带着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存在，使得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复杂。联系本书之立论，西方列强之侵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作用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首先，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新兴阶级的产生。毛泽东写道：“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②作为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这两个阶级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便注定要给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注入新鲜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分别充当了中国政治发展事业的原动力和主导者。

其次，促成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由于西方列强侵略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1页。

的需要，也由于人类文化交流之自身规律的影响，到本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具有很大的革命性，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不过，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其他阶级阶层相比，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具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两大特点。随之而来，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为强烈，政治活动手段和方式也比较新颖。所以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新型知识阶层往往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再次，强化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程度。由于资本主义对传统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吞噬和肢解，以及帝国主义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勒索，乡村广大农民纷纷破产，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70%以上；在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等小资产阶级群众大体也陷入了同样境地。为此，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加之人数众多，势力浩大，他们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赢得的基本社会力量。非如此，则难以有所成。

此外，分裂了中国统治阶级阵营，使其中经常游离出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或附和某种变革的中间势力。相互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使得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了分裂剥削的政策。他们划分势力范围，各自扶植代理人，大大强化了传统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的封建割据状态”^①，进而加剧了中国统治阶级阵营内部的自相争夺与倾轧。其中落败之一方，经常从原先阵营中游离出来，形成所谓的中间势力。革命平稳发展时期，他们往往对进步势力采取容忍或中立之态度；当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则可能背弃原先阵营附和或转入革命中来。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8页。